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a National Image and the Realistic Configur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Yan Wei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ide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community.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by analysis of the four stag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finds that Western civilization generally follows the basic path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economic expansion and conceptual victory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world's political structure. Delineating the historical pedigree of 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ism helps us to reflect on how the physical intervent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shaped the hierarchical sequence of the nation-state unit.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should not only take into account the "na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reflect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 beings when they spread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national imag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actually two aspects of the same concept dissemination. When the mainstream media of China disseminates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 national imag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re actually two sides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ommon ideas. While disseminating China's national image, it is also realizing the realistic configura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pecifically,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methods, both grand narratives and "micro-communic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topics, it is advisable to choose dual

作者简介：阎伟，男，湖北鄂州人，文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英国伦敦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媒介诗学与国际传播。

课题项目：本文系 2020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722020PY009）Sponsor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Program No.2722020PY009）、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1 年度部校共建项目重点项目“危机传播视域下中国百年瘟疫文学的‘信息疫情’书写及国家形象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1229010305）阶段性成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百年·百项”党建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4129043165）。

文章引用：阎伟. 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型[J]. 中国新闻评论, 2021, 2(3): 32-41.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3004>

(multi)-directional and open themes; in terms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 comprehensive use of various advanced technical means should be used .

Key words: China national imag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ommon value; Configuration; Grand narrative

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现实构型

阎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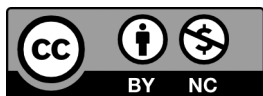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不同民族的社会交往密切相关, 传播技术与理念的发展在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 通过对西方文明四个阶段传播主义理论的梳理, 发现西方文明在确立世界政治格局的过程中, 一般秉承着技术先行——经济扩张——观念致胜的基本路数。勾勒西方文化传播主义的历史谱系, 有助于我们反思信息传播技术的实体介入, 如何形塑了民族——国家单元的等级序列。中国国家主流媒体向外传播时, 既要兼顾“民族的同一性”, 又要体现人类的共通价值。“中国国家形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共通观念传播的一体两面。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 也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型。具体而言, 在传播方式上, 要兼顾宏大叙事与“微传播”; 在传播议题上, 宜选择双(多)向和开放性的主题; 在传播技术上, 要综合运用各种先进技术手段。

关键词: 中国国家形象;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通价值; 构型; 宏大叙事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社会交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不同地区文明的传播与交融,人类共同体也在凝聚成形。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交往和媒介传播的关系时,曾对“精神网络”和“物质网络”间的联合做了总结。他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以及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变化,都将对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相信包括媒介技术在内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决定论,并希望用它们来改革和重铸世界。

十九世纪后半叶,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居住地区的形态。“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通讯的全球化”^①。1850年,电报机使欧洲和北美洲的即时通讯成为现实;1867年,大西洋底铺设电缆,洲际通讯开始实现。继而留声机、电话、广播、电影、电视等一系列创造,又给世界各地文明带来天翻地覆的革命,而这些皆是依靠广泛的技术基础而实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试着把各种媒介手段的变革看作一个严整的体系,例如恩格斯称社会交往革命的第一阶段为“蒸汽交往的体系”^②;而后马克思结合第二阶段的革命,称它为“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③,并从整个体系来考察它的历史意义。1855年,马克思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100倍。”^④这便是前现代各种媒介技术手段带给世界的具体图景。恩格斯在晚年把这幅图景描绘得更为广阔,他写道:“由于交往手段的持久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⑤当马克思把《泰晤士报》和通讯社的电讯看作现代社会交往的象征物时,他实际上也把它们看作是某种媒介革命的结果。

从马克思论述社会交往和媒介传播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逻辑线索。首先,“资本破坏一切旧的生活习惯,摧毁一切利用和交换精神力量的限制,把整个社会,从而把工人阶级也卷入了广泛的社会联系中”^⑥。18、19世纪的革命运动离不开报刊、新闻和印刷,离不开蒸汽机、火车。“工人生存的条件……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⑦。正是这些媒介将精神与物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联了起来,正是这些媒介为现实的社会政治运

① [法] 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 从狄德罗到因特网: 法国传媒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②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九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1.

③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21.

④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53.

⑤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54.

⑥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 [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1993: 502-503.

⑦ [德]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2.

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占有他人意志是统治的前提。”^①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取得主导权,掌权后控制意识形态,正是依靠种种先进的媒介技术手段。资产阶级负有“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②的使命,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已经履行了这一历史使命,资本的力量逐渐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计算机和互联网已逐渐渗入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人们能够自由地获得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的信息,才能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③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媒介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革命,人类整体才能普遍地互通有无,进而实现人的解放,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西方的兴起与文化传播主义的历史谱系

在最近几个世纪,西方文明的对外传播影响了世界发展的历史。根据其传播方式及目的,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18世纪以前是西方文化古典主义的传播时期。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便剖析了西方文化是如何兴起的,并考察了它的传播方式及价值指向。在他看来,“西方文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类型,只是近五百年才出现的历史现象。要想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崛起,只有从世界史的高度考察,才能掌握推动文明和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的文化人群之间的交流接触是使文明演变的主要动力,国家社会群体和文化传播的接触则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主要力量。只有学习和掌握其他文明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自己才能生存和发展。

麦克尼尔认为,“我们完全应该问一下,我们面前是否有其他道路。在理论上,答案是明确的,全人类具有共同性,历史学家渴望深刻地理解它,如同他们理解把较小的集团团结起来的事物一样。一部透彻的世界史渴望培养出个人与整个人类休戚与共的感情,缩小各集团冲突的毁灭性,而不是如狭隘史学那样不可避免地加剧这些冲突”^④。他想强调的是,在观察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时,要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以文化渗透的概念理解世界历史。只有发展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才能有充分的空间容纳人类全部复杂性造成的多样化事实。即使是进入西方大肆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也依然改变不了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事实。

不同文明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以及“整体生存与种属保存的本能”(叔本华语),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3.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2.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

④ [美]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M].孙岳,李永斌,郭方,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33.

即“民族的同一性”。同时，为了维系和巩固这种同一性，内部的信息流通非常关键，交通和通讯方式尤为重要。整体文明的维持要依靠不断的信息沟通，而信息内容与方式的不断变化又促进了文明的演变。随着交流方式的改进，各种文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相互影响，某个单一文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开始萎缩。当它们改变时，这个文明的边界和范围也会发生变化。不同民族和文化被纳入到不断变化的交流活动的体系中，一个新的世界性实体——世界体系——逐渐取而代之成为历史发展的崭新形态。因此，在世界整体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强调信息交流和市场体制的双向依存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政治的多元性，并且要注意人类与共同构成地球生态体系的其他生物的关系。

第二，19世纪是殖民主义的经典世纪。《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一书指出，西方的兴起是通过狭义的殖民扩张、影响和控制半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来实现的。作者布劳特在审视这一过程的同时，批判了世界地理与世界历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

经典殖民主义时代也是经典文化传播主义的时代。经典文化传播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代表狭隘民族国家立场的“西方中心论”和“欧洲奇迹说”，并认为欧洲在历史上的优越性或者先行性的理论是不可避免的和绝对正确。这一传播理论把欧洲内部现实的变化和殖民主义在欧洲以外的扩张联系起来，从影响的路径和效果两个方面，把世界分为内层（欧洲）和外层（欧洲以外）两个部分；内层总是进步（优秀），而外层总是落后（劣等）。^①布劳特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的时间空间理论称为“文化传播主义世界模式”。正是凭借这种文化传播，近代西方文化推动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进程，从而形成了一种“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这一模式是欧洲人造出来的，用来说明辩护和支持其殖民扩张。它不是建立在历史和地理事实上，而是来自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政治-经济理论作了系统的歪曲。欧洲中心传播主义是以传播主义为理论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一理论随着欧洲殖民者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殖民形势与目的，经历了19世纪经典传播主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传播主义的历史演变。两者尽管内容并非完全一样，但都是为欧洲的殖民主义活动提供理论基础与思想支柱，其本质都是维护殖民主义者的既得利益。

第三，20世纪是现代文化传播主义的时期。随着西方国家殖民事业的演变和变化，构成文化传播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崛起，西方的殖民体系已经崩溃。一种现代式的文化传播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一般称为“现代化”或“现代化传播”。

现代文化传播主义仍然是基于第三世界一整套新条件下的思想体系，其要义在于，殖民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获取，必须通过殖民国家的“现代化”传播。“现代化”意味着现代

① [美] J. M. 布劳特. 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M]. 谭容根, 译.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2.

经济、现代公共管理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传播，殖民主义者相信，第三世界国家通过不断接受越来越多的来自原殖民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的支持而取得繁荣。虽然没有赤裸的殖民扩张和军事征服，其目的依然是通过向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输送资金、传播技术等形式，以实现经济与政治上的控制，贯彻其“新殖民主义”的政策。上个世纪初问世的“帝国主义”概念，就是使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概念合法化的政治表述。

第四，21世纪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时期。上个世纪末（1970年代）兴起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以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的言说具有代表性。汤林森接受了其前辈威廉斯关于“文化”和“帝国主义”的理解，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等四个层次予以剖析。^①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帝国主义如今已不再以领土征服和武装霸权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殖民主义活动，甚至通过文化产业、旅行考察和学术讲座的方式征服后殖民地人民。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只能被动接受。面对其文化霸权，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第一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和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寻觅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

从以上四个阶段的传播主义理论中，可以看到一种共性的特征。那就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文化圈中，媒介技术的发展都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对媒介历史的描述，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历史阐释。勾勒西方文化传播主义的历史谱系，有助于我们反思信息传播技术的实体介入，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形塑了民族——国家单元的等级序列。西方国家的每个历史时期与社会阶段都有关于异国形象的传播构型（configuration），这种有着不同层次（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或思想的）和范围（局部的、地方的、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的构型形成一个传播的霸权性概念。一百年来，他们关于异国的政治想象，首先伴随着经济扩张和殖民开拓，其次是现代工业的国际化传播景观，再次是国际与跨文化关系中的景观修辞。无论何种想象，都或隐或显地传递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传播技术的发展与世界政治格局的确立

从以上历史谱系的梳理可以看到，在西方确立世界政治格局的过程中，一般秉承着技术先

^① 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 [M]. 冯建三,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15.

行——经济扩张——观念致胜的基本路数。或者反过来说在实现价值观念霸权地位的目的下，以经济、军事扩张为手段，其前提是技术作为保障。如果说，17世纪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的动员令“把信仰放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还只是一种理想。那么两个世纪后的罗马教皇自信地宣称“用传道网络把地球包围起来”，已经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把这种理想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19世纪经典文化传播主义时期，西方文明的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和军事征服，同时用宗教的方式来确立语言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力量是资本主义形态的帝国地缘政治学的基座。物质基础的更新始终在催生新的战略思想，技术决定论最终兑现了意识形态决定论。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迅速更新的现代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西方的文化思想观念更加迅速地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而加快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世界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产生了，西方扩张的历史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同时可以确切地说，共同的命运已超越了人类其他一切文明、野蛮和蒙昧。但在这次融合中，西方民族由于比其他任何民族具备了更突出的优势，如对传统制度价值的坚定信念，以及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以及最有效的媒介技术和交通网络，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殖民侵略活动而引起的其他民族的反抗行为。

在法国传媒学家马特拉看来，文化和传播网络的建构撑起了帝国的霸权，他甚至认为，“传播后来成了度量一个民族实力、社会福利、繁荣、文明和国民政治自由程度的尺度”^①。西方国家征服远距离空间的投送物质能力，帮助他们获得全球范围的霸权政治效果，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实现了他们支配世界的雄心。在帝国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优势，终于在随后通讯领域中找到新的争霸方式，其历史注脚就是19世纪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电缆公司拥有的决定性霸权（英国资本主义的成功典范），以及21世纪美国对因特网的垄断控制。这一百年间，几乎每种非西方文化的最初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技术作用的结果。也是由于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的全面落后，这一百多年来，中国被排除在世界共同体的大门之外。

在梳理“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生过程之中，汤林森重点辨析了媒介在帝国主义扩张运动中的关键作用。“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之一，就是西方经过媒体中介“强加于”他国的文化。以媒介帝国主义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也就说明媒介是观察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特别方式。“文化帝国主义”主张媒介是整体支配关系的重要环节，它采取一个更具有整体性的媒介角色观，涵盖了文化传播所涉及的全部政治议题。透过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可以看到文化支配的真正内涵。一是代表某种文化的媒介，支配了另一种文化的媒介表现。这些外来的媒介对于第三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会造成分裂，使得这些文化无法再连结成气而发展；二是“经由大众媒体作中介的文化”已然扩散全球，尤其是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念。

① [法]阿芒·马特拉. 全球传播的起源[M]. 朱振明,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文化帝国主义延续了19世纪经典及20世纪现代文化传播主义的立场,相信在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内,现代化的西方“核心”国家支配了人文及自然资源的分配。无论是“现代世界体系”还是“核心—边缘”模式,它们强调的是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整编”和“系统性”的本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往往使资本的效益逻辑高于权力的地缘逻辑。资本逻辑采取的策略是,将所有的媒介及其相关业务,以及众多的科技产品整编进入资本主义所支配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整体结构中,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从“军事—工业”的国家结构一直到“公民——消费者”的个体经验,都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行为及世界观产生直接、综合的影响。

四、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型

当今,中国面对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张的世界政治格局,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奉献给全世界的新型政治架构,它超越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近年来也逐渐受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接纳。那么,在深入地推广这一理想并在现实构建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媒介有组织的传播,切实有效地实现这一理想,就成为中国文化传播一项重要的任务。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兹?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第54章)从世界文明相互交融的历史来看,共同体是一个容纳自我与他者的共同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国家将自身的发展置入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之中,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才能寻求不同文化中的“共通价值”,并培养“共同命运”感。不同文明的每一次交流与镜鉴,都是在展示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形象,并希望获得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接受与认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二元对立的怪圈,超越东西方等级秩序和狭隘的民族情绪,最大限度地向异质文化汲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

那么,中国国家主流媒体向外传播时,“中国国家形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国家形象的传播关注民族主义的意识,即“民族的同一性”;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人类的共通价值,即“价值的一致性”。媒体的作用就是通过传播实现两种价值的融合贯通,从“如何形成自我”到构建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的宏大愿景,那么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将会有助于这个愿景的逐步实现。人的命运共同体是未来的道义理想,而中国国家形象则是现实的责任担当。媒体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的同时,也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型。具体而言,在传播方式上,无论是中国国家形象,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外传播,要兼顾宏大叙事与“微传播”。

2014年,中国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论,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基于这一顶层设计,2016年新华社更新了对外报道的基本理念:国家站位,全球视野,事实说

话,融通中外,平等交流。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指出主流媒体要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国家主流媒体(纸媒、电子媒体)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成为完成宏大叙事的主要平台。近年来,这类具体实践频频展开,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和爱奇艺等多方媒体联合出品的微纪录片《从长安到罗马》,还有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微纪录片《中国微名片——餐桌上的节日》,以及新华社和新华网等合制的微纪录片栏目《国家相册》等。

同时,在新媒体时代,由于新媒体话语注重主体性的张扬,个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兴趣在网络上跨时空形成不同的共同体。随着新媒体的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内容多样化和传播范围全球化,国家形象的观念传达方式也越来越平民化、草根化。其次,传播内容也越来越微观具体,由传统媒体关于国家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宏大叙事转为对经济、旅游以及个人交往等方面的经验表达。再次,由于传受者身份的区分日益模糊,对参与主体在信息交流过程中所持控制权的判断越来越困难。传播观点的社会层级也不再泾渭分明,实现了全民参与。新媒体给国与国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互动注入了更多的类似人际传播的特征。

一些新媒体技术中的社交媒体,因为方便、快捷、不受时空限制的交流方式,可以实现即时自由的个人传播,具有强烈的“微传播”的特点。同时,社交媒体不仅仅是一种传播技术,而且还有一种在场的社交氛围。强烈的带入感、参与感和沉浸感,足以颠覆和重构传统独白式的话语方式和不对等的对话规则,更易于我们以协商传播的方式把国家形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到世界。基于此,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平台型媒体自然地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比如B站中就有不少UP主的身份是在华的外国人和在外国的华人,这些单个主体上传的音视频动辄达到上百万播放量,因此这种“微传播”对我国和别国的形象建构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在微观主体层面上,中西方的世界观便完全可以在社交媒体的对话场中通过更接地气的议题讨论而相互显现和相互参照,由广泛沟通进而达成共识。

那么,在设置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议题时,无论是采用议论性话语文本还是故事性话语文本,宜选择双(多)向和开放性的主题,以充分包容各种可能的异质性对话(讨论)要素,从而唤起和引导世界各地持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来。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具象化的话题表达过程中,叙事的方式要更加多元和复调化。最近几年上映的中国大片,上座率及票房收入都较为突出的一些作品,在这方面就有充分考量。比如在电影《长城》中,景甜饰演的中国主帅和马克·达蒙主演的西方白人雇佣兵携手作战,就表现了不同肤色、语言的民族共守美好家园的愿望。根据《三体》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中的高潮部分:在修复苏拉维西站发动机组时,中国女孩韩朵朵发出全球广播后,多国救援队

纷纷掉头前来支援的场面，也充分诠释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即使是由中国传统神话改编的电影《哪吒——魔童降世》，在当今也有了新的命意——在四十年前的同名动画片《哪吒》中，哪吒与龙子敖丙生来不共戴天的仇恨，弥漫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斗争哲学。而在新片《哪吒——魔童降世》中，哪吒和敖丙来自同一颗灵珠，两人是命运共同体，结局则是他俩携手对抗天劫。

统而言之，我国的对外传播应认识到这样一条原则，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且二者互为依托。在传播方法上，无论是宏大叙事、微观传播还是新媒体技术，应配合运用。同时应该及时跟进和创新前沿传媒通讯技术，制定阶段传播策略。在传播内容方面，则应尽量追求叙事方式的多元复调化，叙事角度的全球化，充分包容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的声音，以此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型。

五、结语

从20世纪初开始，大众传播媒介技术拓展了世界，同时带来了日益扩大的一致性。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子媒介技术加快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多样性之间的重合，是与一种现实政治共同体的到来同步的。

随着网络技术的出现，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必须顺应更为广阔、渐渐扩大到全球的趋势。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3D打印等等都是这次革命的主要内容。雷吉斯·德布雷将不同时段占据支配地位的媒介，与一种文化霸权所覆盖的空间范围联系在一起。他以媒介作为文明分期的标志，认为一种新媒介的优长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他眼里，世界版图被勾勒为一个书法的东方、一个印刷的欧洲和一个电子屏幕上的美国。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技术的手段，欧洲将其独特性的文化实践化约为一般的印刷资本主义，美国将其价值观延展为国际互联网 Internet，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利用先进的传媒技术宣扬自己的价值理念也就成为眼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以后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如果中国疏远科技新闻领域，错过了量子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那么即便不是物质上被殖民，也会有一种在精神上被支配的威胁。